

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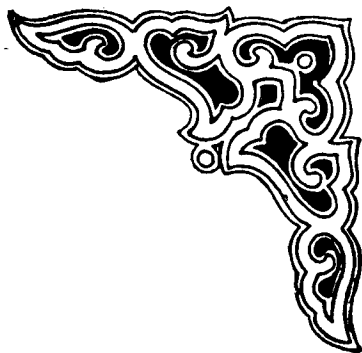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

刘乃昌
高洪奎 著

刘乃昌
高洪奎 著



王安石

诗文编年

选释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鲁新登字2号

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

刘乃昌 高洪奎 著

*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25印张 5插页 243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00

ISBN 7—5328—1485—8/I·40

定价: 5.05元

前 言

“荆公六艺学，妙处端不朽。”这是黄庭坚《奉和文潜赠无咎》篇中的诗句。由于王安石坚持变法，生前和身后挨骂很多，人们反对他的政治观点，不免牵怒于他的学术，因此，能象山谷那样对其经术作出客观评价的，在宋人中并不多见。不过对其文学成就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，连政治上反对他的人，也不能不表示倾服。魏了翁说：“元祐诸贤，号与公异论者，至其为文，则未尝不推许之。”〔1〕事实确是如此。这表明王安石文学的奕世光采是特别引人注目的。清代有人读荆公集，感慨地说：“虽作宰相，终为诗人。”〔2〕言外之意仿佛是：王安石并不是一位如愿以偿的政治家，而最终归宿则是一个成功的诗人。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，下面我们要谈的是荆公杰出的文学成就。

（一）

王安石戛戛独造的文学成就，来自他独特的创作个性，而其创作个性的形成，是紧密联系着时代环境，离不开个人的生活道路的。

王安石（1021——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临川）人。晚年封荆国公，死后追封舒王，谥号文，故亦称荆公、舒王、王文公、王临川。

王安石出生于中下层官吏家庭。父亲王益，祥符八年（1015）

进士，释褐后宦游建安（今江西全州）、临江（今江西清江）、新淦（今江西新干县）、庐陵（今江西吉安市）、新繁（今四川新都县西北）等地，后迁韶州（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）知州、江宁（今南京）通判，是一位比较体恤下情，敢于抑制豪强的官吏。“为人倜傥有大志，在外当事，辄可否矫矫不可挠。”〔3〕王益刚毅敢为的性格对王安石有所影响。生母金溪吴旼之女吴氏，世居临川乌石冈，安石少年多次往返其地。安石兄弟七人，他排行第三，其弟安国、安礼都有文名。夫人吴氏，亦能诗，残存小词断句，诗话称为“脱洒可喜”。

王安石的时代，是社会矛盾日趋深化的时代，也是有眼光的士大夫为摆脱王朝危机而竭力寻求出路的时代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发展，北宋封建生产关系所孕育的诸种矛盾也暗中增长，冗官、冗兵、积贫、积弱的局面逐渐形成，因循逸豫、苟且偷安的风气浸染日深。尤其农民起义不断发生，辽夏咄咄逼人，更使人感到内外交攻、忧患严重。建国之初所采取的强化封建集权、稳定统治秩序的一些方针和措施，这时也效应日减而弊端日著。这种局面在部分政治家中间，便激起了要求更革的声浪。王安石正是在这种时代气氛中走向社会的。

临川王氏，从安石叔祖起，到他的同辈，几十年间登进士者有六、七人。王益教子有方，常“从容为陈孝弟仁义之本，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。”〔4〕安石自幼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少好读书，为文敏捷，立志要有所树立，自期颇高。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，回忆了他少年的情景。王益做官常携家同行，安石早年即随父辗转各地，南到韶州，北游汴梁，这使他有较多地接触社会，开扩了眼界和胸襟。少年王安石，可以说是一位有志匡时、意气颇盛的轩昂儒生。

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王安石十九岁，父亲在江宁通判任上病逝，从此全家定居江宁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他由江宁赴

京应试，次年中杨置榜进士第四名，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开始进入仕途。他先在扬州韩琦幕下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，庆历七年调充鄞县（今浙江鄞县）知县，皇祐三年（1051）改派舒州（今安徽安庆市）通判，至和元年（1054）调京任群牧司判官。当时士大夫建议朝廷重用王安石，欧阳修在奏章中称赞他“学问文章，知名当世，守道不苟，自重其身，议论通明，兼有时才之用”。^[5]只要本人乐意，他满可以从此留京，跻身清要。然而王安石无意做官，志在有为，一心想能“得因吏事之力，少施其所学”，^[6]因而迭次申请外任，嘉祐二年被派知常州。到常州不久，又于嘉祐三年二月到饶州（今江西波阳县）任提点江东刑狱。同年十月，召入汴京为度支判官。在京期间，曾奉敕伴送辽使回国，行至涿州而还。嘉祐六年，迁知制诰，八年，母吴氏卒，护丧归葬江宁。

王安石从开始入仕到四十三岁丁忧江宁，二十多年来除两度在京任职外，大部分时间做州郡官吏。与那些因循逸豫、保禄保位的庸俗官僚不同，他勇于任事，能够体恤民隐，锐意兴革，并且坚持一面勤理邑政，一面认真读书。如据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十一载，他在鄞县“读书为文章，三日一治县事，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；贷谷于民，立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；兴学校，严保伍，邑人便之。”在舒州，他考查闾阎疾苦和邑政弊端，写成《发廩》、《感事》等诗，借以感悟朝廷，勉励僚友，并研究杜甫佚诗，写了《老杜诗后集序》。在常州，曾关注教育，约请青年诗人王令到郡修学。在饶州，他了解江南榷茶的情况，立即写了《议茶法》，奏明朝廷，用百姓运销、官府收税的办法，取代了弊端百出的专卖制。在京任三司判官后，政务之暇，他研读宋次道家藏唐诗百余编，就此纂成包括一百零四家诗歌的《唐百家诗选》。在这期间王安石留心吏治和民情，注意观察社会矛盾，回京后综合多年累积的材

料，深思熟计，写成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、《上时政疏》等著名政论，就宋朝社会政治全局性的问题，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意见，为后来的熙宁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。这一阶段，王安石变成了一位比较了解社会民情，勇于开陈政见的地方能吏。

王安石守丧期间，朝内皇位迭经更替。仁宗于嘉祐八年病死，英宗赵曙继位仅四年即已谢世，继之登基的是年方二十的神宗赵顼。赵顼不满国势贫弱，很想振作有为，留意物色宰辅，娴习吏事、卓有声望的王安石，便成了合适的人选。安石“质朴俭素，终生好学，不以官职为意”，^[7]素有恬退之称，前期不愿留京做官，英宗时期一直在江宁居丧，神宗嗣立后始出知江宁府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四月，朝廷召他越次入对，安石大约感到际遇难得、施为有时，毅然赴京。神宗问为治所先，安石对以“择术为先”。又问立国百年无大变之故，王安石退而写成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奏进，激励神宗决心改革。次年，四十九岁的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，后又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从此他成为深受皇帝信赖、敢于立排众议、坚持变法的执政大臣，在朝内主持了历时六、七年的熙宁新政。

王安石当政后，创置三司条例司，议行新法，几年之间，均输、青苗、募役、保甲等法次第推行，同时整顿学校，改革考试制度，使培养擢用人才适应新法需要。新法主要针对有宋百年来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，在理财、整军、调整官僚机构、发展农业生产方面，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。新法的推行，在抑制富商大贾和兼并势力，缓和财政危机、增强国力方面，虽然在一定时期收到某些实效，但它的最终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因为一方面，虽然有个别君主的支持，但在封建专制主义体系下，依托庞大官僚机构，在短期内展开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改革，本来就极难控驭，另一方面，王安石固然有果敢进取、坚毅不挠的政治素质，但也有听言不广、自信太过、操之过急、

择吏不精等缺点。这些不利因素集聚到一起，必然会造成种种弊端。因而随着新法的实行，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与日俱增，以后随着反对派围攻下神宗的开始动摇而出现形势逆转，这迫使王安石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乞解机务，出知江宁府。虽然次年二月即应召复相，但复相后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变法派的内讧，同僚吕惠卿的背叛，儿子王雱的病没，使王安石陷入极度苦闷和孤立，不得不于熙宁九年再度求去，最后退出了朝廷。王安石秉政期间，虽机务繁剧，但仍不废学术翰墨，他除了主持重训诗、书、周礼，完成《三经新义》外，还为推行和坚持新法，写了不少政论。秉政后期的诗文，也反映了推行新法受挫后的种种思想矛盾。

王安石五十六岁罢相后，回江宁度过了十年退休生涯。最初还带着“判江宁府”的头衔，熙宁十年六月，连这一职务也索性辞掉，只保留集禧观使的名义，以便领取薪俸。“乞得胶胶扰扰身，五湖烟水替风尘”，罢政初归所吟的诗句，反映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。他在城东和钟山间构筑了“半山园”，房屋虽不华贵，环境却极清幽。钟山定林寺中，还专有书斋一处，供他写作和会客。他的日常生活多是读书、诵诗、谈禅、出游，“平月乘一驴，从数僮，游诸山寺。欲入城，则乘小舫，泛潮沟以行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。”〔8〕这时他俨然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山林隐士。

不过，王安石是饱经沧桑、满怀激愤、从激烈的政治斗争舞台上被迫退居山林的。他毕竟身离魏阙而心萦现实。他把部分精力倾注在学术著作上，修改订正了《三经新义》，完成了《字说》二十四卷，于元丰三年（1080）奏进朝廷。他还写了《歌元丰》《后元丰行》等诗篇，反映新法的实绩。他的园林生活，外观看似平静，但内心充满波漪。安石早年即怀有“才成霖雨便归山”的志趣，可惜的是他的“归山”，不是酿成霖

雨后的功成身退。大半生的政治理想和官场搏斗，给他的内心世界投下了趋除不掉的魔影，泉石雅趣和佛学道书，可以使他求得某些解脱，但到底无法弥合心灵的创痛。这些都不能不在他晚期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记。元丰七年春天，王安石大病之后，奏舍半山旧宅为“报宁禅寺”，暂时于城内税屋以居。次年神宗病死，旧派上台，新法罢废殆尽，王安石闻讯苦闷异常，“在书院读书时，时时以手扶床而叹。”〔9〕在一封家信中，他凄然地说：“予老病笃，皮肉皆消，为国忧者，新法变更尽矣！”〔10〕虚弱的身体，经受不住深重的刺激，六十六岁的王安石，便于哲宗元祐元年四月，含愤病逝了。

王安石崇奉儒学，倾慕为倡导“仁政”解民倒悬而奔走毕生的孟轲，“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”。但他思想较为开阔，并不为儒术一派所囿，自谓“自百家诸子之书，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，无所不读，农夫女工，无所不问。”〔11〕他赞同庄周“百家众技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”的观点〔12〕，对佛学、老庄和法家思想亦多所探究，并在博观约取的基础上重新训释经籍，形成著称一时的“新学”。其新学体系，在哲学上，认为由五行变化构成万物，天象人事无不“新故相除”，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倾向；在政治上，力倡明法、择吏、理财，希求“改易更革”，反对“因循苟且，逸豫而无为”；〔13〕在学术上，敢于创新，主张“通经致用”、不泥成说，认为圣人之术，“在于安危治乱，不在章句名数”〔14〕。王安石的从政态度，是随着他的仕宦经历和际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。大抵早期志高气盛，锐意进取，颇露锋芒。当政阶段，始则知难而进，果毅敢为，独排众议，力行改革，及至“群疑并兴，众怒总至”，深感“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，势所不能”，〔15〕于是踌躇再四，决心急流勇退。闲居以后，眼见政局逆转，回味世情炎凉，不免百感丛生，忧愤交并，只好向田园的恬静和佛老的

遗世忘情中，寻求暂时的心理平衡。当时的社会条件，注定王安石的改革理想必归于失败。他与苏轼的改革主张和宦途经历各有不同，然而，他们的政治生涯同样是悲剧的。

（二）

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文，主张为文“以适用为本”，“务为有补于世”，^{〔16〕}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。在文道关系上，他反对“辞弗顾于理，理弗顾于辞，以骈积故实为有学，以雕绘语句为精新”，而赞成“表里相济”、文道统一。^{〔17〕}王安石的文论对于矫正宋初的浮靡文风是有意义的。但他同许多政治家一样，常常把文章的内容等同于“礼教治政”，而把表达形式称之为“辞”，比之为“器之有刻镂绘画”，与“三苏”的文学主张相较，不免有忽视文学特性的倾向。

王安石的散文，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，多为有关政令教化，适于世用之作。集中有书疏、奏状、札子、论议、书启、记序等体别，其中以政论文、书札序跋文、记叙文、小品文几类比较重要。

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，直接为变法服务，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针对赵宋王朝面临的内外矛盾和统治危机，提出了陶冶人才以改革法度的系统政治主张，是最早展示王安石全部变法路线的宏文。嘉祐六年写的《上时政疏》，从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，建议仁宗正视宋廷的政治危机，更革“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”的积习，及早实行“众建贤才”“大明法度”的方策。应神宗询问所写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、在回顾了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的历史状况之后，着重剖析了“累世因循末俗”之积弊，敏锐地指出了表面承平的局势下所隐伏的种种危

机，深刻阐明了变法改革的紧迫性。《上五事札子》是总结新法施行情况的一封奏章，它肯定“和戎”、“青苗”已取得成效，说明“免役”、“保甲”、“市易”正待展开，至关利害，强调能否“得其人缓而谋之”，乃是后三项新法成败所系。这些政论都紧密联系王安石的政治实践，是为推行新法制造舆论而作的。梁启超说：“公论事说理之文，其刻入峭厉似《韩非子》，其强聒肫挚似《墨子》”^{〔18〕}。颇能道着王氏论文刻至、朴挚、峭厉的特色。王安石的论文犀利透辟，议事论政反复剖白，深中肯綮。这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吏能，洞悉时事，较少书卷气。王氏议政，惯于标榜师古据经，如《上五事札子》说新法“可谓师古”，免役出于《周官》，市易“起于周之司市”云云，每谈新法总爱溯源于经传，时人谓其“议论人主之前，贯穿经史古今，不可穷诘。”^{〔19〕}但他据经而不拘，师古而不泥，故对先王强调“法其义”，对群经则往往“断以己意”，带有托古改制的色彩。行文条分缕析，局段井然，短篇密合无间，长文也经纬分明。如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篇幅恢宏，脉络却有条不紊，沈德潜誉为“部勒有方”，说：“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，中间丝联绳牵，提挈起伏，照应收缴，动娴法则，极长篇之能事。”^{〔20〕}

王安石的书札文，议政论学居多，长于说理，而感情色彩不浓。如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、《答吕吉甫书》、《答姚辟书》、《答曾子固书》，或申论变法，或探究学术，都表现出理足气壮，果毅不挠，而能简当精警地阐明个人见解，可否判然，决不含混调和。另有一些叙旧写怀、陈述身边琐事的手札，如《与王禹玉书》、《答孙少述书》、《回苏子瞻简》，也能运笔自如，略展心曲，惟大都意淡言简，涵蕴不露，很少淋漓酣畅的感情渲染。王安石自谓“某天稟疏介，与时不相值，生平所得，数人而已”^{〔21〕}。这种落落寡合的性格，人们不难从他的

书札中窥知一二。他的序跋文字，评论经籍文章，时有所见，文风也很谨严。如《周礼义序》、《诗义序》、《书义序》、《老杜诗后集序》、《张荆部诗序》等，均辞气高古，笔力俊拔。这些书札序跋，大都劲悍廉厉，简核老当，没有枝辞赘语，体现了王氏散文的特色。

《临川集》中记叙体散文不多，但颇能别开户牖，引人瞩目。《游褒禅山记》结合记游华山，阐述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；《越州余姚县海塘记》通过记谢景初筑海堤，说明为吏治邑，应当急民之急；《伤仲永》借早慧儿童变为庸材的事例，强调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；《芝阁记》写珍贵的灵芝在不同时期，或增声价或遭遗落，感叹人才进退的机缘，常常出于偶然。这些文章立意深远，卓有识度，不专主叙事，而在于借题发意，因事明理。写法上由事件生发出见解，由感性升华到理性，叙述与议论相结合，颇有引人入胜之效。

警策精练的小品文，是王氏散文中的妙品。它常以极简当的议论，一语破的的断语，撷写一种别具心眼的识度和见解。如《读孟尝君传》、《读柳宗元传》、《孔子世家议》、《太古》、《知人》、《鲛说》等，都是一二百字的短文，但言简意深，令人领略不尽。《知人》裁剪王莽、杨广、郑注的历史故事，说明奸佞善于矫情伪装，以假象迷人，从而论证知人之难。全文只有一百多字，论据充实，说理显豁，笔墨极为经济，一字不可增损。《读孟尝君传》不满百字，却以斩钉截铁的笔力，一下把“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”的旧案，翻转过来。篇幅虽小，却几经折转，文势不平。这类短文，局段不凡，含意丰腴，文情跌宕，颇有“尺幅千里”之势。

王安石的散文，当时即受到文坛盟主欧阳修的爱赏，友人曾巩曾编选时贤佳作，名为《文林》，对王文选录颇多。王安石早年散文不够疏展，偶有模拟痕迹。故庆历间欧阳修曾建议

他“少开廓其文，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”，“孟韩文虽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”〔22〕。王安石记取前辈启示，随着阅历和学问的增长，散文修养日有进益。后来散文创作变得气足辞顺，渊懿朴茂，师法前人而能出其所自得，独立风格逐渐形成。王文识度高远，长于独抒己见，决不人云亦云。在局段结构上，力求经济而严紧，用墨仿佛压缩到最低极限，不容忍有无谓的间隙和浮泛的话语。刘熙载《艺概》说：“半山文善用揭过法，只下一二语，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，是何简贵！”正指出了这一特色。王文的语言，没有绚丽的色彩和雕饰的痕迹，而以简劲朴奥精洁见称，可以说迭经锤炼，字字坚实，确能做到如他所说“词简而精，义深而明”〔23〕。王文运笔遒健老当，使篇中回荡着倔强之气、峭折之势，形成一种峻洁严整峭厉劲拔的风格。王安石为文取法韩愈，参酌韩墨，而自名一家。韩愈散文兼有平易条畅和奇崛劲峭。欧王都追迹韩愈，欧发展韩的平易，王吸取韩的劲峭。故梁启超谓“公与欧公同学韩，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”〔24〕。不过，比起韩愈，王文法度较整，规摹稍狭，缺乏纵横排荡的气势。

（三）

江西派诗人徐俯在《画虎行》中说：

忆昔余顽少小时，先生教诵荆公诗。

只今耆旧无新语，赖有庐山病可师。

大诗人杨万里《读诗》绝句亦云：

船中活计只诗编，读了唐诗读半山。

不是老夫朝不食，半山绝句当朝餐。

两诗都反映了王安石的诗歌在南宋广为传诵、深受赞赏的情况。《沧浪诗话》论列历代诗体，北宋只取苏、黄、王等三四家，王诗单列一格，称为“王荆公体”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杨蟠云：

介甫“于诗尤极其工，虽婴以万务，而未尝忘之”^{〔25〕}。说明王安石于诗歌创作用力甚勤。王安石存诗，据《临川集》统计，共有一千六百余首，古体四百一十五首，律诗一千一百九十二首，其中绝句五百七十余首。李壁笺注本比《临川集》多出几十首，但不免有误收他人之作。

退隐之前，王安石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搏斗了几十年，这种生活道路决定了政治诗和社会诗在他的前、中期占有重要地位。针对政治弊端和民生疾苦，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，表达鲜明的个人见解，是这类诗的一般特色。不过此类诗歌不大为前人所重，究其原因，除了所表达的改革主张可能不为时人赞同外，其艺术琢磨不及后期诗歌精粹，也许是重要因素。其实，王氏政治社会诗的艺术表现方法，也是多种多样的。《省兵》、《收盐》、《兼并》、《感事》、《发廩》等，直泻胸臆，侃侃陈辞，难免有点象堂而皇之的政治意见书，留给人们回味的余韵较少。但它们或为解决冗兵耗财提出新颖政见，或对食盐专卖给予严峻抨击，或揭露豪民贪官鱼肉贫民，或指斥俗儒庸吏纵容兼并、贻害国家，就其素材的典型、思想的深刻、识见的敏锐等方面来说，也确有超乎他人之处，是不容予以否认的。至于象《秃山》、《同昌叔赋雁奴》、《日出堂上饮》、《赠陈君景初》等篇，同样尖锐地提出重大的社会课题，但能借助寓言故事来体现，政见即寓于情节叙述之中，这比之那些过于发露的直陈体，显然是富有吸引力的。王安石还用精练的律绝体来反映社会问题。如忧虑旱灾伤农的《读诏书》、《舒州七月十七日雨》，不满当时考试办法的《详定试卷》、《试院中》等，可以说继承了杜甫以近体诗写时事的传统，做到了凝练的形式、含蕴丰富的语言与现实性内容的有机统一。再如悯农的绝句体小诗：

金屏翠幔与秋宜，得此年年醉不知。

只向贫家促机杼，几家能有一絢丝？

——《促织》

柔桑采尽绿阴稀，芦箔蚕成密茧肥。

聊向村家问风俗，如何勤苦尚凶饥？

——《郊行》

前首借诘问促织，反映百姓极度贫困，以小见大，手法新巧，后首以蚕茧丰收的景象与农家的依旧凶饥对照，收尾以问句醒题，促人深思。此外，以歌行体写的《河北民》，无论思想或艺术都较为出色。所以王氏的政治诗、社会诗，不能说仅以内容取胜，其多数篇章内容和形式还是大体统一的。

作为改革家，王安石对北宋面临的国防问题，极为关注。他模拟白居易所写的《何处难忘酒》，紧密联系饮酒写出了与国共休戚的政治情怀。缅怀张巡、许远的《双庙》诗，颂扬了唐代名将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。《西帅》激励王韶经略西境为国立功。《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》、《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》诗，欢庆王韶收复熙河的胜利。这些诗篇都洋溢着爱国热情。嘉祐五年初春王安石伴送辽使回国时，在往返途中写成了四十来篇诗歌，大致以关注国防为主题，而尤以结合沿途形胜忧叹边防空虚的《澶州》、《白沟行》等诗，最有现实意义。《澶州》为题的诗有五、七古各一首，诗人路经澶州，唤起了对五十六年前“澶渊之盟”事件的重新思考，发出了“戈甲久已销，澶入益憔悴”的感叹，这无异是对宋廷屈己事敌方针的痛切批判。《入塞》诗写边民心情：

荒云凉雨水悠悠，鞍马东西鼓吹休。

尚有燕人数行泪，回身却望塞南流。

诗人特意勾画了前来送行的燕云人民面向中原泪流满腮的形象，是含有深意的。这类使北诗多随地抒感，使乡思怀归、忧念国事的感情同沿途风物结合交融，格调沉挚，可说是南宋范

成大等人使金诗的先声。

王安石常批评别人读书太少，他确是一位饱学之士。他谙熟史事，取资浩博，以此所作怀古诗、咏史诗颇多。如《次韵登微之高斋有感》、《和微之重感南唐事》、《自金陵至丹阳道中有感》等，都是借南朝旧事，感叹封建政权的兴灭，而用以讽谏当朝的。《金陵怀古》四首，更是这方面的力作，诗人把眼前实景、当年史事和个人的感慨议论揉合在一起，写得雄浑典重、苍凉悲慨。“豪华尽出成功后，逸乐安知与祸双”，这深刻而警策的议论，对宋廷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。王氏咏史兼用古、近体，以立意新颖见长，大致可分三类。其一，借咏历史人物寄托个人抱负的。如《贾生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商鞅》、《诸葛武侯》等，所咏的人物大都是作者所敬佩的楷模，前贤的正面形象中，凝结着诗人的追求和理想。《贾生》中的“所论多感慨，自信肯依违？”《孟子》中的“何妨举世嫌迂阔，故有斯人慰寂寥。”既是对前人的向往和赞颂，又是诗人的自期和自勉，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坚持个人理想而不怕孤立的倔强性格。其二，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，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。如《开元行》、《宰嚭》、《读秦汉间事》等。《开元行》评述唐玄宗前期与后期的功过得失，说明朝内任用非人，就会造成四境不安，这是借唐史对宋廷提出告诫。其三，借咏史发表个人的新见特识的。如《窥园》、《赐也》、《范增》、《读史》、《乌江亭》等，所咏虽多为历史旧案，所见却与众不同。项羽乌江自刎，杜牧《题乌江亭》，从“包羞忍耻”重振旧业出发，吟出了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的名句。王安石则从项王失掉人心，大势已去的角度看问题，发表了与杜牧全然不同的见解：

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

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为君王卷土来？

——《乌江亭》

立意很为新颖。《赐也》取材于《庄子·天地》篇所载子贡被汉阴老人说服的故事，表达了诗人反对抱残守缺、赞成技术进步的崭新见解，有力地回敬了守旧的言论。《明妃曲》二首是咏史名篇，当年欧阳修、司马光、刘敞、曾巩等诗人都有赓和，而王氏所作，独能以翻新出奇的手笔，掇发出石破惊天的议论，一时引起世俗瞠目，毁誉纷纭。王安石的咏史诗取材广泛，立足现实，以形象的语言，发新警的议论，力避浮泛之谈，喜作翻案之笔，尤以七绝小诗锻炼精粹，常能一语破的。

王安石在前中期直面现实，锐意进取，写诗多感怀现实、题咏政治，如象《到家》、《若耶溪归兴》、《泊船瓜州》一类出色的写景诗、感怀诗，寥寥无几。退闲以后，摆脱政网，放浪形骸，寄情于山颠水涯，销愁于禅理道书，于是写景咏怀之作大量产生，《临川集》中风韵翩翩的写景抒情绝句，大部分作于晚年。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。其中有写江南美景的，大都以秀雅的诗笔，描写郊原小景，风物宛然如画，生活气息很浓。如：

金陵陈迹老莓台，南北游人自往来。
最忆春风石坞路，家家桃杏过墙来。

——《金陵》

径暖草如积，山晴花更繁。
纵横一川水，高下数家村。
静憩鸡鸣午，荒寻犬吠昏。
归来向人说，疑是武陵源。

——《径暖》

有写诗人陶醉于大自然的闲静情趣的，前一种诗仿佛是较客观的写景，这一类诗则作者与环境达到物我交融，充满了舒闲容与之态。如：